

·专题研究· 文章编号:1000-8934(2001)08-0049-07

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

朱 高 正

(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本文旨在阐明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为此分别地回顾了东西方文化的变迁,追溯了500年来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强调了利玛窦、莱布尼兹和吴尔夫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中国文化;文化交流;东方与西方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与长江中、下游,约8000年前已有聚落出现。四五千年前已经出现统一中原的黄帝,而伏羲则是比黄帝早得多的传说中的帝王,号称“人文始祖”。在4000年前世袭的夏王朝建立,随后由商王朝取而代之。到3100年前,文王之子武王伐纣,建立周王朝。《周易》,或称《易经》,就是成书于商末周初的经典。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都城东迁,是为春秋时代,200多年后进入战国时代。自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并灭六国,统一天下以来,对中国人而言,世界就是天下,天下就是世界。万里长城将中国与北方的游牧民族隔开,在始皇帝统治之下,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也采用同一标准,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以外则是蛮夷之地。秦末天下大乱,北方的匈奴坐大,时扰边关。因此,汉朝自武帝(公元前2世纪)开始征讨匈奴,经营西域,致匈奴西窜,导致后来欧洲民族大迁移。东汉和帝命窦宪讨伐匈奴,南匈奴投降内附,北匈奴则西遁“不知所之”,越两百年窜抵欧洲,迫使日耳曼人南移,导致西罗马帝国覆亡。三国时期以来,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大力经营江南300余年,使得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而佛教则在东汉即已传入中国,盛行于隋唐。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七世纪)玄奘远赴天竺(即今之印度)求经,回国后埋首翻译佛经,奠定汉传佛教的基础,并撰著《大唐西域记》,对西域各地风俗民情多有介绍。惟天竺与中国交通阻隔,双方交往困难,不若吐蕃(即今之西藏)与印度交流之密切。而此时基督教与回教也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当

时在中国北方的突厥人为唐国所败,向西逃窜,两百年后抵达近东,接受了回教,而取代了原有的回教帝国。13世纪值南宋中叶,成吉思汗在漠北崛起,统一蒙古各部族,灭西夏之后,率军西征。其子孙窝阔台汗与忽必烈汗又灭金及南宋,并向西征讨,直抵东欧,建立横跨欧亚两洲之大帝国,掩有东欧、中亚、印度与中国。明朝时,郑和七度下西洋,历时28年足迹遍及东南亚的爪哇、苏门答腊、锡南、印度西海岸、波斯湾、阿拉伯的麦加,甚至远抵东非的木骨都东(Mogudiscio)即今之索马里的摩加迪休,这已经是15世纪初的事了。郑和本为云南昆明回族马氏,后经明成祖赐姓郑,因此回教就随着郑和的舰队传播到东南亚各地,华人大量移居东南亚也自郑和开始。东南亚华侨后来对中国革命出力甚多,而今仍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颇有影响。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倭寇不断袭扰东南沿海,后虽经戚继光、俞大猷平定,但颁行海禁。1498年达伽玛绕过南非好望角,打开通往东方的航道,1514年葡萄牙商船抵达中国南方,开启了中国与基督教世界的交往。在此之前,与中国交往的地区,不论是北方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与满族,西方的西域、吐蕃、天竺,东方的高丽、日本、琉球,还是南方的越南、中南半岛以及东南亚地区,可说除了印度传来的佛教以外,文化水平皆不及中国,大多数是中国的藩属。就算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与满族曾先后在中原建立政权,但最后仍融合在中国文化的大家庭里。

收稿日期:2001-04-25

作者简介:朱高正(1954-),台湾林云人,哲学博士,主攻法哲学。

1 西方“世界中心”的递变

西方文明并非源自欧洲,而是发源非洲的埃及和近东两河流域(即今之伊拉克)。埃及文明可推到公元前4000年以前,到公元前3000年已出现统一的国家。两河流域则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出现巴比伦帝国,尔后常沿着地中海沿岸的走廊与埃及发生争战。公元前553年在两河流域以东的伊朗高原地带波斯兴起,先后占领两河流域及叙利亚,于公元前525年灭埃及,是为波斯帝国。在公元前五世纪初,波斯帝国两次渡海进攻希腊,均败师而返,希腊自此兴起。随着长年与波斯打战,埃及与两河流域的文化经由爱琴海传播到希腊半岛。然而由于半岛上各个城邦不能团结,而于公元前338年为半岛北方的小国马其顿所征服。马其顿国王菲力及其子亚历山大大帝均有雄才大略,团结希腊,组成希腊联邦,出兵征讨波斯。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3年击败波斯,占领叙利亚,接收埃及,并攻进伊朗高原,抵印度河。希腊文化就在公元前四世纪,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足迹向东传播。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23年病逝,帝国分裂为三,百余年后为新兴的罗马所征服。罗马本为意大利半岛上的城邦,渐渐发展,于公元前202年第二次与迦太基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罗马帝国才开始向外发展,四处开疆辟土,掩有地中海沿岸的欧、亚、非领土。公元前1世纪,凯撒征服了高卢的野蛮人(即今之法国),帝国的北疆就以莱茵河、多瑙河和日耳曼蛮人为界,东边则与波斯为邻。公元4世纪,帝国为了防范波斯,重心东移,形成东西罗马分治的局面,而基督教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公元476年罗马城为日耳曼蛮人所攻占,西罗马帝国灭亡。自此欧洲进入四分五裂、小国林立的“黑暗时代”几达1000年。而东罗马帝国则与波斯陷入长期的毁灭性战争,双方都日趋贫弱。在伊朗高原的波斯曾一度为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但公元前170年又从希腊人统治下崛起。罗马帝国占领叙利亚与两河流域之后,多次想征服波斯,但都功败垂成。东罗马帝国与波斯之间长期的消耗战,这给7世纪初崛起的阿拉伯绝佳的机会,当时波斯为阿拉伯帝国所灭,而东罗马帝国则丧失在北非的统治权。8世纪回教帝国内部分裂。200多年后,即11世纪初,从中国西奔的塞尔柱突厥人灭了巴格达的

回教帝国,击败东罗马的军队,威胁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遂向罗马教皇求援。

其实,基督教会刚于公元1045年正式决裂为二:东部教会由君士坦丁堡大主教领导,称为东正教;西部教会由罗马城大主教领导,称为天主教。东正教用希腊语祈祷,主要向斯拉夫人传教;天主教用拉丁语祈祷,主要向日耳曼人传教。东正教的各地大主教由东罗马帝国皇帝任免;天主教的罗马城大主教称为教皇,有任命各地主教的权力。当教皇接到东罗马帝国皇帝求援时,就从1095年发动了十字军东征,与回教徒争战百余年,直至蒙古人西征时,才缓和下来。但在蒙古人退出叙利亚之后,鄂图曼土耳其帝国乘机崛起,终于在1453年灭了东罗马帝国。在西欧自11世纪以来,罗马教皇手握权柄,遂行神权统治,西欧几乎彻底基督教化,教会在各地所坐拥的教产往往数量可观,由修道院培养出来的教士则任职于各个城邦、侯国。教皇对各个城邦的侯王握有废立之权,这个状况要到15世纪由于东罗马帝国沦亡,一批希腊学者由君士坦丁堡逃亡意大利,促成西欧的文艺复兴,才逐渐发生变化。佛罗伦斯的马基亚维利(Nicolas Machiavelli, 1469~1527),法国的柏丹(Jean Bodin, 1529~1596)以及英国的霍布士(Thomas Hobbes, 1588~1679)鼓吹巩固王权,因而摆脱教廷影响的世俗专制王权日渐兴起。与此同时,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英王亨利八世与喀尔文(John Calvin, 1509~1544)等人倡导下,出现宗教改革,以各自方言翻译《圣经》,德文、英文、法文《圣经》版本的问世,似乎也预告教皇大一统时代的结束,促使英国与法国分道扬镳。那也是大冒险、大航海的时代,西班牙王室热心支持新航路的探寻。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在此之前欧洲人只知道越过波斯,在遥远的地方除了印度,还有中国。经由丝路,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茶叶颇受欢迎。原东罗马的领地,大概是今天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一线以东,本来信奉东正教,但自从蒙古大帝国没落后,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就取代了东罗马帝国的地位。西亚、中亚、北非,甚至欧洲的巴尔干半岛都是回教的势力范围。由于鄂图曼帝国的阻隔,西欧通往东方的陆路通道中断,他们只能从《马可波罗东游记》中得知中国的繁荣富庶,因此寻找通往东方的航道就成为当时冒险的热点。当达伽玛在1498年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

时,一个崭新的世界图像呈现出来了,欧洲与世界各地的贸易(或掠夺)也开始了。对西方人而言,显然“世界中心”是由小亚细亚,而希腊,而罗马沿着地中海而西移。对当时大多数的欧洲人而言,在他们皈依基督教以前,是野蛮无文的,因此就认为所有尚未皈依基督教的地区也是野蛮无文的。先前在非洲与美洲的探险经验增强了这种信念,但与中国接触后,则产生了巨大的震撼。

2 重启中西文化交流

1585年龚萨雷兹(Juan Gonzalez de Mendozas 生卒年不详)搜集西方传教士与远赴东方的欧洲商人有关中国的报导,编纂成书,已广泛引起欧洲人的注意。当时由于明朝实施海禁,以及不懂中国语文,因而有关中国的报导大多局限于地理与风土人情,但却已经不只一次提到孔子了。当时欧洲人对报导中所提及中国历史的悠久,深感诧异。如果报导属实的话,那中国历史将比《圣经》中的《创世纪》更为久远,这涉及世界起源的问题。须知,直到十八世纪末,欧洲人仍认为世界起源于耶稣诞生前四千年。因此,他们不相信中国历史悠久的报导,直斥之为“童话”。倒是令他们讶异的是,何以中国古代没有关于“大洪水”的历史记载。因为依据圣经的记载,上帝后悔造人于地上,因此除了诺亚一家之外,要用大洪水“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这使得欧洲人怀疑大洪水可能只是地区性,而不是世界性的灾难,这挑战了圣经的权威性,也促成了18世纪圣经考古学的研究热潮。

在耶稣会教士华里纳诺(Alessandro Valignano 生卒年不详)的倡议下,他们决定要学习中文,研究中国的经典,不把中国当成无知的野蛮人来看待。其实中国文化对十七八世纪欧洲的知识界到底有多深远的影响,迄今尚乏认真的研究。但是无论如何,由于与中国接触,使得基督教世界的视野扩大了,甚或是爆炸了。有人干脆用哥白尼的新发现,比喻中国对欧洲的冲击。1582年,时当明朝末年,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来到中国,1601~1610年住在北京。他是个虔诚的耶稣会教士,也是个饱学之士,堪称是欧洲第一个汉学家。利玛窦对中国的了解影响深远。他认为光从“中国是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拥有极其众多而且爱好和平的人民”这一点,就足以令欧洲人惊讶和赞叹。欧洲

各国不仅历史短浅,国土面积狭小,政治上四分五裂,文字各不相同,与中国相较显得贫穷,尤其那时欧洲各国还为了宗教改革而面临大分裂。利玛窦是透过朱熹的新儒学来了解中国的社会、国家体制与士大夫阶层。时当明朝末年,朱熹的《四书集注》、《周易本义》乃是科举应试的士子所必读,朱子的学说深刻地影响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以及社会、国家体制。利玛窦认为儒家思想在伦理道德、国家管理以及政治哲学上都非常杰出,值得欧洲人学习。利玛窦指出,中国文化虽然由释、儒、道三家交融而成,但他认为佛、道两家无法对现世的社会及国家体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儒家可以为政治、行政、哲学、科学、教育体制与礼俗规范提供准绳,扮演类似“国教”的角色,使精神、文化生活与社会结构互为表里、融为一体。尤其有关善恶学说,利玛窦发现儒家思想并不借助于任何形式的“天启”,而是直接诉诸人的理性。无论是公或私的领域,善意与善行都不是靠外在(法律或礼俗)或内在(神的赏罚)的强制,而是靠古圣今贤的典型来自我砥砺。因此对像利玛窦这么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言,也不得不同意这种学说,难怪他推崇孔子是古代最伟大的哲人之一。做为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认为在中国传教不是在纠正错误的信仰,而是在肯定儒家思想的前提下,使儒家思想臻于完善,易言之,藉着基督教的“天启”,给由人的理性论证出来的道德予以不可撼动的支撑。中国与欧洲比,无疑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就只欠宗教而已,他希望中国也能成为“上帝的国度”。至于中国人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祭孔或祭祖,利玛窦认为这与宗教信仰无关。而且他也肯定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远比欧洲的教授更具影响力,因此,他要求耶稣会传教士着中国服装(不穿神父的服饰),并适应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多交往。在他看来,服饰、生活习惯与宗教信仰无关,宗教信仰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由于他努力与欧洲知识界频仍通讯介绍中国,并大量出版图书资料,对当时欧洲影响颇大,尤其是法国。因为耶稣会教士中,法国人最多,而在17世纪下半叶号称“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文化水平执欧洲的牛耳,而这时正是启蒙运动的前夕。

3 耶稣会与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在利玛窦的努力下,耶稣会在中国传教得到空

前的成功。到清康熙三年(1664年)受洗人数已经多达257000人,教堂159座。但是从1630年起,天主教的其他教派,道明会与方济会也开始前来中国传教。他们由于对中国文化了解有限,以正统自居,完全站在西方的立场,认为教徒不可以祭祖,并攻讦耶稣教士不着神父制服,而着异教徒的服饰,因此,一状告到梵蒂冈。教皇多次派遣特使前往中国了解,终因歧见太大,而于1715年谕令禁止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在中国方面,康熙皇帝本已于1692年下诏容许各个教派自由传教,而今耶稣会因容许教徒祭祖而遭教廷禁止在中国传教。言下之意,日后信基督教者不得再祭祖,自古“百行孝为先”,无父则无君,是可忍,孰不可忍。几经交涉,乃于雍正即位后,即1723年,下禁教谕。但是耶稣会教士则在中国仍一直担任钦天监的职位,直到1801年。

值得一提的是清圣祖康熙皇帝(在位期间1661~1722年)在十七八世纪之交,被他同时代的欧洲思想界推崇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因为他领导着一个庞大而廉洁的官僚体系,要求达官显贵都要为帝国与人民的福祉而工作。在他统治之下,中国的人口大量繁殖(1650年约1亿人,1800年则为27500万人),平定台湾,并臣服蒙古与西藏。康熙皇帝是位典型的“哲王”,不仅使中国的学术、文化绽放璀璨的花朵,也将道德原则提升到指导政治生活的规范。他不仅对中国的四书五经有精湛的造诣,对西洋的学术也充满兴趣,他本人也曾撰述《数理精蕴》一书。在1689年俄罗斯与中国边界发生纠纷时,他也重用耶稣会教士参与调停,并协助以拉丁文起草“尼布楚条约”。1692年他更下诏准许各教派传教自由,当时中国的基督教徒已逾30万人,这种治国的胸襟与器度对当时为宗教战争所苦的欧洲毋宁是个楷模。

这就难怪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于1699年其《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一书再版时,特别将康熙皇帝的画像置于首页。莱布尼兹是当时欧陆理性主义的代表,与英国的牛顿同时发明微积分,也是全世界最早发明计算机的人。他透过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白晋取得六十四卦方圆图,并发现其与二进制算术的一致性,坤到乾六十四卦刚好为零到六十三。因此在1703年他向英国皇家院提交论文“关于仅用零或一两个记号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并附有其效用及关于据此解释中

国古代伏羲图之探讨”。在天主教会为了中国传教而发生礼仪争议时,莱布尼兹是当时欧洲唯一支持耶稣会做法的哲学家。莱布尼兹自1689年即与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经常通讯,到他去世为止,未曾中断。他认为欧洲人应向中国人学习,尤其是在伦理道德与政治方面。在中国,政治为道德服务,一切的政治作为都要谋求公共福祉与个人幸福的增进。他对中国的兴趣,并非为了研究陌生的世界,来满足好奇心与求知欲,而是要为欧洲引进有益的理论与实践。莱布尼兹强调,欧洲人和中国人一样,也拥有理性,但是理性在中国却起着巨大的作用。尤其在实践哲学的领域,理性为中国带来很大的进步。儒家学说对莱布尼兹而言,不仅正确,而且有用,尤其当人们考虑到欧洲在道德上堕落的时候。莱布尼兹甚至想从中国语文发展出哲学的世界语言,并提出世界公民的理想,他建议成立“世界科学院”(Welt-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来负责推动这个构想。他认为“普鲁士学院”也应致力于使中国的知识对欧洲有所助益。

4 莱布尼兹与吴尔夫皆推崇中国文化

继莱布尼兹之后,欧陆最主要的理性主义代表当推吴尔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他是德国启蒙运动的要角,提出历史上第一份人权清单,是18世纪上半叶欧洲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莱布尼兹的哲学经由他的努力,系统化而成为莱布尼兹-吴尔夫的理性主义哲学,而这正是康德批判哲学的出发点。吴尔夫著作等身,其“数学”、“物理学”、“形而上学”、“一般实践哲学”、“自然法”、“伦理学”等拉丁文著作被当时欧陆各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吴尔夫中年以后,更将其主要著作一一译成德文版,由于将哲学术语由拉丁文译为德文,以致对日后德国哲学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吴尔夫与莱布尼兹一样,对中国文化极为推崇。他曾担任启蒙运动的重镇哈勒大学(Universitaet Halle)的校长,1721年7月12日任期届满,在离职演说中,他提及其实践哲学基本上与中国孔子的学说并无二致,引起轩然大波。因而于1723年吴尔夫被迫离开哈勒大学的教职。1726年他将离职演说稿整理为《关于中国人的实践哲学的讲话》(Oratio de sinarum philosophia practica)一书,并详细附加216个注解,付梓出版。经过一番折腾之后,1740年吴尔夫光荣地重回哈勒大学。

事实上,早在1712年,吴尔夫就曾经为文介绍法国耶稣会教士诺尔(Francois Noël)翻译并于1711年出版的《六本中国经籍》(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与小学。诺尔是位杰出的几何学家、数学家与天文学家。他曾为中国28个城市确定经、纬度,也为像爪哇或为马达加斯加等大岛重新定过地理位置。诺尔翻译的这六本经籍是以朱熹的注解为基础,诺尔的译本将儒家最重要的著作翻成拉丁文,对当时欧洲思想界而言,是很好的版本。而诺尔的译本就成为吴尔夫了解中国文化最主要的依据。吴尔夫认为,儒家学家对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影响,要比《圣经》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大。在1718年吴尔夫在其著作中即强调在一般实践哲学的领域,其学说与中国的儒家学说若合符节。吴尔夫哲学的基本概念是“完善”(Vollkommenheit),而他依据诺尔的译本得知孔子主张人有理性(Verstand),经由格物致知,可以分辨善恶,从而决定其意志(Wille)要好善恶恶。一切行为的目标乃在谋求自身行为与他人行为的完善,而“最高善”则是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纵使它永远也无法达到。而这不就是《大学》开宗明义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吗?

吴尔夫于1720年出版的《德文版伦理学》(Deutsche Ethik)中,第一编就是“一般实践哲学”,它综论伦理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三门学科共通的基本原理。在此他表现出是个典型的理智主义者,主张正确的行为并非建立在意志决定之上的(意志常常是任性的,不能用理性解释),而是在“理性的洞见”(vernunftige Einsicht)之上。惟有理性才能分辨善恶,从而成为决定行为的动机。他认为一切的恶行来自于无知、愚昧与错误。他说:“由于能洞见事物关系的是理性(Vernunft),因此理性也能辨别善恶,理性要求我们行善去恶”,“客观上的善与恶的结果,可为人的理性所认知,因此,理性不需基督教的天启,甚至不需任何宗教”,“理性乃自然律的大师”(见《德文版伦理学》第23节)。吴尔夫仿效后期经院学派的口吻说道:“就算没有上帝,人的自由行为仍有善、有恶”(见上引书第五节),“就算是无神论者,也可以有正确的知见及行为”(见上引书第27节),“就算没有上帝,自然律仍然有效”(见上引书第20节),“藉着理性,人就是他自己的律则”(见上引书第24节)。在此,吴尔夫突出理性的重要性,这在久

经神权统治的基督教世界,是件极不寻常的创举。对吴尔夫而言,宗教在行为问题上并非不重要,只是不是最重要而已。尽管他与中国人在宗教信仰上有所区别,但这并不影响彼此对实践哲学有相同的看法。因此吴尔夫提出“自由行为的一般规则”:“做那些使得你或他人之状况能更完善的事;不要做使得这些更不完善的事”(见上引书第12节)。1720年7月12日,吴尔夫接任哈勒大学的简短就职演说中,又称赞中国的国家学说在道德实践上有较好的效果,中国人由于谨遵孔子的学说而使得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1721年4月吴尔夫在其《德文版政治学》(Deutsche Politik)第一版前言中就提到,中国在统治艺术上超过其他各民族。在“德文版政治学”中,并没有探讨儒家的国家学说,但却指出中国的“胎教”为小孩日后的健康与教育奠定良好的基础,且认为“胎教”是极度理性(hoehst vernunftig)的表现。

5 “关于中国人的实践哲学的讲话”

在1721年7月12日的离职演说中,吴尔夫首先指出何以题目不是“孔子的实践哲学”,而是“中国人的实践哲学”。他说孔子并非中国哲学的创始人,在孔子之前已经有很多重要的哲学家,他们多是古代的哲王,所谓孔子“言必称尧舜”,“述而不作”。这些哲王自身都有很好的道德修为,足以为臣民的表率。孔子是诞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他试图将尧舜之道发扬光大,以拯救世道的衰微。孔子之于中国,犹如摩西之于犹太人,穆罕默德之于土耳其人,耶稣之于基督徒。然后就进入主题,他强调中国之所以有如此杰出的典章文物制度就因为运用理性(ratio)的缘故。吴尔夫将道德分为三个层级,以道德是建立在自然的力量、自然神学或天启的真理之上而定。他认为中国人的道德是建立在自然的力量之上,因此,中国人的道德应属最低层级。但“自然的力量”(Kraefte der Natur)足以分辨善恶,因此中国人据此足以行善去恶,其道德行为是建立在很好的理由之上。他介绍中国古代经籍中对于教育体制中有关小学和大学的区分,小学教育主要是经由对长上的敬畏来培养顺从的道德,大学教育则是经由理性,探讨事物之理,即穷理尽性,以培养独立自主的道德,后者亦称为君子之学。《大学》一书正是教人如何循序渐进,止于至善。理性的完善乃道德洞见与道德行为的前提。在此,吴尔夫特别提及中国人

的“胎教”，也就是在女子怀孕时，以音乐或讲述前言往行来达到教育胎儿的目的。在当时欧洲的自然科学也已证实，母亲与胎儿之间存在着肉体与灵魂的联系。而中国早在耶稣出生以前，就已有“胎教”的习俗，这种理性的产前道德教育不得不令人佩服。在离职演说结束时，吴尔夫再次强调其实践哲学与中国的儒家学说相一致。

吴尔夫这篇校长离职演说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其实践哲学与基督教世界——以神学立论的——伦理学之差异，过去只是在其著作中以隐晦的方式表达而已，而今却以公开的方式，向全校的教授与学生陈述。他是以儒家学说在中国社会的实践，来否定以神学立论的道德哲学，因此显得颇具说服力。没有宗教的道德，在理论上不仅可能，它毋宁是一个既予的事实，它在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与国家生活中已被证实。它是纯粹哲学的、非宗教的道德，中国人不应被视为一般的“无神论者”。在演说中，吴尔夫固然没说在中国传教是多余的，但他也没说是必要的。中国人并不因没有宗教而让人觉得惋惜，毋宁是正因为没有宗教而仍有良好的道德风俗而令人赞叹，中国无疑是欧洲的楷模。非基督教世界的中国思维方式，由此看来，并非错误的根源，而是合于理性洞见的根源。吴尔夫的离职演说无疑是德国启蒙运动的讯号：公然向教会天启的权威挑战，充分相信理性的自主能力。

6 从“中为洋用”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转变

除了利玛窦及其耶稣会教士对中国的研究，以及莱布尼兹与吴尔夫等欧洲第一流哲学家对中国的推崇以外，在1685年荷兰商人圈子则流传出对中国的负面报导。事实上，1602年荷兰人在印尼成立东印度公司，1624年占领台湾以后，就想方设法企图垄断欧洲对中国的贸易。孰知1661年荷兰人被中国的郑成功打败，退出台湾，而1683年康熙皇帝又命施琅平定台湾，荷兰人眼看要垄断中国市场已不可能，因此在1685年出版有关中国的报导中，怒斥中国人为“天生的骗子”。但这种看法对当时欧洲思想界的影响要迟至18世纪中叶时，孟德斯鸠才对耶稣会所讲述的“在中国理论与实践一致”的观点提出质疑。然而在18世纪下半叶，康德的著作中，对中国

仍多持肯定。到了19世纪，由于欧洲工业革命在英、法、比、荷等国已基本上改变了社会生产关系，再加上1840年英国为了出售鸦片而向中国发动了一场不名誉的战争，从而揭开了欧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序幕。自此，中国在欧洲的图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值得吾人讶异的是，早在1514年葡萄牙的商船已抵达中国南方，而在这100年前，郑和下西洋时已远达非洲东岸，这意味着当时中国并非没有远程航海的实力与经验，为什么中国当时没想到也绕过好望角，探访一下未知的世界。在1601年精通中文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已抵达北京，并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士大夫过往甚密，他们曾将部分泰西名著译成中文。但耶稣会教士能够花上百年的功夫将中国的儒家经典详加译注，介绍给当时欧洲思想界，从而在启蒙运动中，“中为洋用”，使没有基督教会的中国一而再、再而三成为伏尔泰所引述的对象。耶稣会也对当时欧洲的第一流哲学家如莱布尼兹与吴尔夫提供中国的第一手材料，扩大了他们的视野。同时与欧洲接触的日本，在十八九世纪时兰学（即由荷兰引进的西学）已成为显学，何以在中国知识界一直到洋务运动以前仍然看不到西学的踪影。反观中国在19世纪初虽先有包世臣、龚自珍等人倡议改革，后有林则徐与魏源帮国人开拓视野，但也仅只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必得等到19世纪末，甲午战败后，严复才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呼声。即使如此，时隔100年，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西学在中国仍难谓之为显学。

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中，与中国来往的多为蛮夷之邦，因此当与基督教世界接触时，仍然将洋人视为夷狄。中国长久以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只要蛮夷不侵扰边疆，向来多任其自生自灭，未曾想要征服蛮邦。十五六世纪欧洲人为了寻找新航路，而开启大航海的时代，以当时中国的人力、物力、造船技术而论均在洋人之上，只因缺乏诱因，再加上明朝晚期的海禁政策，使得中国人习于闭关自守，缺乏冒险进取的精神。当18世纪欧洲对中国，尤其是中国的长处，相当了解的时候，中国人仍自以为是，对历经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洗礼而迅速崛起的泰西诸国仍懵然无知。这就难怪在鸦片战争英国人戳破了这只纸老虎的假面具后，欧洲各国争相投入抢食中国这块肥肉的行列。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on the West

ZHU Gao-zheng

(International Academy in Oriental 1-Ching Theor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For the purpose of expounding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on the West, the paper looked back on the cultural change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traced back to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for 500 years, and laid stress on the place in history of Matteo Ricci,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and Christian Wolff.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exchange; the East and the West

(本文责任编辑 王国政)

(上接第 40 页)

On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Scientific Researches

ZHAO Le-jing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Southwest Forestry College, Kunming 650224, China)

Abstract: Specific measures such as the landmark Bayh-Dole Act of 1980 which enable university to claim ownership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generated from federally fund have helped universities commercialize innovation but in doing so may raise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scientific researches. The issues raised by conflict of interest must be faced openly, standard must be in place to prevent some of these occurrences, and the process of moral reasoning must be fostered to help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facing these issues deal with them rationally and effectively.

Key words: conflict of interest; value free; theory laden; disclose the conflict

(本文责任编辑 马惠娣)

(上接第 44 页)

是人与电脑之间的互动。电脑网络的操作已成为信息时代劳动操作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操作方式,在工业社会,人从属于机器,并随机器的转动而运转,机器成为非人性的强迫性技术,人性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满足。智能机的出现,使机器具有“人味”,人不再迁就机器,而是机器开始迁就人,灵活工时、灵敏制造的现实说明了这一点,未来的高智能计算机对人的了解将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不相上下。因此,在网络时代人不再被物所役,而物为人所用。网络将使机器真正地为人服务。更关键的是人作为最终的信息接受者,具有完全决定权。

参考文献

[1]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135.

[2]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160.

[3] 贝尔.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26.

[4] 彭齐阿斯. 迎接一个和谐的时代[J]. 世界科学. 1996(6): 20.

[5] 尼葛洛庞蒂. 数字化生存[M]. 海南: 海南出版社, 1996. 140.

[6] 奈斯比特. 大趋势[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16.

[7] Lester C Thurow.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M]. Penguin Book. 1996. 65-87.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218.

[9] John Brockman. *Digerati* [M]. Hard Wired Compang. 1998. 102.

Current Changes of Practice Mod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Informationization

LI Yin-rong, GAO Xian-zhong

(School of Humanity and Arts,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Social informationization propelled by modern technology revolution has been giving rise to changes in the mode of human practice. How does the technology influence human practice mode? The thesis makes a study. Based on the study, the authors aim at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social informationization on practice media system, practice subject and practice object. After the analysis the thesis also intends to describe the new characters of modern practice mode.

Key words: social informationization; mode of practice; changes; characters

(本文责任编辑 马惠娣)